一九七一年

七　　月

七月四日

美国《芝加哥太阳时报》说，美曾有摧毁中国的绝密战争计划。并说，这项政策在 一九六一年‘ 改变了 ”。

该报说，进攻中国的政策是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杜勒斯在一九五四年提出的“ 大规模报复 ”计划的一部分。

该报在提到华盛顿《明星晚报》七月一日发表的那些文件时说，在同一年，国家安全委员会曾讨论了进攻中国以帮助法国继续控制印度支那的可能性。

该报说，但是，由于艾森豪威尔和英国（在进攻中国时是需要它的帮助的）的反对，这个建议夭折了。

该报说，肖普曾说，他认为在一旦同苏联进行核战争时进攻中国的计划，是由于在迅速改变导弹袭击目标方面在技术上有许多困难而提出的。

该报援引肖普的话说：“ 显而易见，如果每个人都明白这个意思，就不会有人反对改变这个导弹系统。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花了一年的时间才变成有选择地对准目标的这种做法。 ”

（合众国际社芝加哥七月四日电，《参资》七月五日（下）第七页）

七月六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对美中西部新闻界介绍情况时说：“ 当然，大陆中国的情况有很大差别。首先就目前的经济能力而言，表明它的现状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有一亿人口的日本生产的东西比有八亿人口的大陆中国多。但是这不应当使我们产生错觉，不应该使我们和世界市场上的任何一个潜在的竞争者有自满的感觉，认为中国将始终是那样，因为当我们看到中国人的时候 —— 我在全世界都看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了他们，你们中间的有些人也看到了他们，不管是在香港、泰国、新加坡、曼谷、马尼拉或其他有中国人的任何大城市，他们是富有创造性，有生产能力的，他们是世界上最能干的民族之一，八亿中国人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巨大的经济力量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其他方面所能取得的成就，如果他们朝那个方向行动的话。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美国政府必须首先采取步骤来结束大陆中国与世隔绝的状态。我们必须采取这些步骤，因为由于目前存在的看来是无法调和的分歧，苏联不可能采取这些步骤。我们是能够采取这些步骤的唯一国家。

“我想说，我在谈这个问题时是非常有限制的，因为我们不应该认为，已经发生的事情比实际发生得多。我们所得的就是把门打开——把旅行的门打开，把贸易的门打开。

“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是否会把其他的门打开。但是至少门必须打开，美国的政策目标从长期来看，必须是结束大陆中国的与世隔绝状态和使我们同大陆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因为向前看，向十五年到二十年以后的情况看，美国可能同苏联达成限制武器的非常有效的协议；到那时，那方面发生对峙的危险可能几乎完全消除了。

“但是，大陆中国同世界大家庭完全隔绝，而它的领导人也不同世界上的领导人联系，这对全世界来说将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这将是不能接受的，对我们和别人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

“因此，现在必须采取这个步骤。由于对方采取了相应的步骤，因而还必须很明确、很审慎地采取另外一些步骤。

“但是现在让我们看看如何使这一切同我刚刚提到的经济计划和经济挑战相配合。我们采取的结束大陆中国与世隔绝的政策取得成功这件事本身将意味着他们的经济挑战将会大大升级，这不仅仅是对我们的挑战，也是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挑战。

“现在让我再回过头来谈谈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在八亿中国人向世界开放门户，从而不可避免地将会出现各种联系和交流思想的活动的情况下，他们将成为世界上一支具有巨大潜力的经济力量。”

（美新处堪萨斯城七月六日电，《参资》七月八日(下)第十五页）

国务院发言人布雷七月六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就对华贸易问题答记者问。

布雷说：“星期五（七月二日）在这里有人问我，自从总统六月十日宣布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贸易政策以来，这方面有什么新的情况，去大陆旅行的情况如何。

“我们所知道的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就是乒乓球队、一些你们都知道他们的名字的记者及夫人、两名美国科学家、十三名学生、另外还有十人左右，但是没有商人。

“自从总统六月十日作出宣布以来，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消息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进行任何重大的直接贸易，但是，看到报上报道了看来是间接进口了中国的商品。自六月十日以来，我们听到了美国制造商的各种出口建议，但是我无法证实任何一笔作成的交易。”

（美新处七月六日电，《参资》七月七日(下)第三页）

加拿大《新闻报》七月六日刊登题为《新基地,美国从印度刺探中国》的文章说，美 在印设立了秘密电子系统窃取我核装置情报。

文章说：“时代一邮报新闻社获悉，美国为了取代已经失去的在巴基斯坦的间谍基地，已在印度设立了一个高度秘密的电子系统，以便收听中国核武器和导弹方面的活动情况。”

文章说：“这个系统的目的同以前在巴基斯坦北部的白沙瓦设立的电子间谍基地的目的和在土耳其设立雷达部队收听俄国南部的苏联导弹和空间装置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样的。

“在印度以北的新疆省的中国核装置和导弹装置的许多情报并不是卫星侦察来的，而是通过这里的电子“偷听器”取得的，据信这个系统可以扫描这个次大陆以外的印度洋目标。它还能够收听巴基斯坦的活动情况。”

（新华社渥太华七月六日电，《参资》七月十三日(下)第十页）

七月八日

美国一反华团体所谓“反对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百万人委员会”头目李·爱德华兹宣布，七月十二日到十四日将在华盛顿搞反

对中国进入联合国活动周。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七月八日电，《参资》七月十二日(下)第五十页）

七月九日

美国当局无理扣留从加拿大转运抵美的我国食品。

（美联社旧金山七月九日电，《参资》七月十二日(下)第五十四页）

七月十二日

纽约一反动团体“帮助吸毒者自动停止吸毒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威廉·贝尔德在美国国会关于中国问题特别意见听取会上诬我“私运鸦片”，并反对恢复我联合国席位。

（美联社华盛顿七月十二日电，《参资》七月十四日（下）第七十四页）

七月十五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接受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邀请的声明全文如下：

晚安。我要求在今晚利用电视台的这段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为了建立世界持久和平而作的努力中的一件大事。

正如我在过去三年多次指出的那样，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七亿五千万人民的参加，是不可能有稳定和持久的和平的。正因为如此，我在好几个方面采取主动行动，为两国之间的比较正常的关系敞开门户。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派遣我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他最近的世界之行中前往北京，以便同周恩来总理会谈。我现在宣读的公告将同时在北京和美国发表。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预料在这一宣布之后不可避免地会有猜测，所以我想对我们的政策作最清楚的说明。我们谋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的关系的行动不会以牺牲我们老朋友们的利益为代价。

这不是针对任何其它国家的。我们谋求同一切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

任何国家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而不致成为任何其他国家的敌人。我之所以采取这个行动，是因为我深信所有国家都将从缓和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改善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中得到好处。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将进行一次我深深希望会成为谋求和平的旅行——不仅谋求我们这一代的和平，而且谋求我们在其中共同生活的这个地球上的将来世世代代的和平。

谢谢你们，再见。

（美新处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七月十五日电，《参资》七月十六日(下)第五页）

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一些议员都对尼克松将访华表示欢迎。

南达科他州民主党参议员乔治·麦戈文七月十五日说，这“标志着长期以来在我们对华关系中的荒唐局面的结束”。

（美联社、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七月十五日电，《参资》七月十七日(上)第一页）

七月十六日

美新处以《对北京的访问将在外交上产生副作用》为题报道说，白宫官员们强调指出，“在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中所作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具有反对其他任何国家、特别是反对苏联的目的，或者是以任何方式针对它们的。”

（美新处圣克利门蒂七月十六日电，《参资》七月十七日(下)第十四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法新社七月十六日综述一九七〇年一月至最近的中美关系大事记：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一日——恢复了中断两年之久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九日——由于美国出兵柬埔寨和扩大印度支那战争，中美大使级会谈推迟举行。

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五日——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开始了对中国的六个月的访问，在这期间，他曾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四日——中国政府发表谴责美国出兵老挝的声明以后，北京举行了大规模的反美示威游行。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日——北京政府抗议美国军舰和飞机对中国渔船的挑衅。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七日——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人现在可以去中国旅行无需特别许可。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日——美联社记者约翰·罗德里克，全国广播公司电视记者约翰·里奇和杰克·雷诺获准随同美国乒乓球队到中国进行采访。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三日——美国乒乓球队应邀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结束时访问中国以后，在北京同中国乒乓球队进行比赛。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生活》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毛主席和尼克松总统都表示对会见对方感兴趣。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日——据贝鲁特左派报纸《斗争报》说，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正在访问的阿拉伯记者时建议同美国直接谈判。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三日——美国科学家阿瑟·高尔斯顿和伊桑·西格纳到达北京进行访问。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日——白宫公布了现在可以不受限制地向中国出口的一百四十三种货物的清单。

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总理会见了美国记者西摩·托平、威廉·阿特伍德和罗伯特·基特利。

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一批十三名美国学生开始在中国访问。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北京举行会谈。

（法新社香港七月十六日电，《参资》七月十八日(上)第五十一页）

七月十七日

合众国际社报道，前国务卿腊斯克在《亚特兰大宪法报》发表文章说：“在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世界上，象大陆中国和美国这样两个大国彼此应有正常的接触渠道。”

（合众国际社亚特兰大七月十七日电，《参资》七月十八日(上)第五页）

七月十八日

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爱德华·弗里德曼载文谈美谋求发展对华关系的考虑，标题是：《毛长时期的追求到很晚才取得成果》。

弗里德曼认为，美想同中国改善关系是出于国内外经济压力、全球战略破产，不得不把重点排了先后次序，而同西欧合作，以加强美经济地位，成了优先考虑的问题。

（新华社伦敦七月二十日电，《参资》七月三十一日（下）第三页）

七月十九日

美新处综合报道尼克松上台后对华关系的作法和罗杰斯在中美关系方面起的作用，报道说，罗杰斯在尼克松政府对外政策机构中起关键的作用。

报道说，尼克松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日当政之后仅仅十天就提出了关于改善关系的第一个建议。罗杰斯的国务院一九六九年夏季作了第一个公开的努力，这就是放松对大陆中国旅行和贸易的限制。

一九六九年七月和八月国务卿罗杰斯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亚洲问

题的讲话，目的是表明美国对北京的新的态度。

白宫人士具体地援引罗杰斯一九六九年八月八日对澳大利亚堪培拉全国新闻俱乐部的谈话，当时，罗杰斯说，中国由于它自己采取的做法而与世界其它地方隔绝的时间太长了。

国务卿罗杰斯说，放宽贸易和旅行的限制是为了“消除我们关系中的引起不愉快的感觉的东西，并有助于向大陆中国人民提醒我们对他们的历史性的友谊。

那时，罗杰斯还提出在华沙或“另一个双方都接受的地点”恢复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大使级接触，他说这可以导致缓和紧张局势。

几天之前，罗杰斯在香港时对北京未对尼克松政府的姿态作出反应表示失望。

在表明北京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的第一个迹象出现之前，尼克松政府在贸易和旅行方面又采取两项公开的步骤。

既然基辛格之行已经众所周知，总统的决定已予宣布，美新处说，尼克松宣布访华后，罗杰斯就着手同其他国家政府商讨尼克松拟议中的这次访问的意义。

报道说，罗杰斯应尼克松的要求，取消了关于在伦敦作一次演讲的约会，以便在华盛顿处理其他国家政府提出的问题。

报道说，白宫人士说，在总统研究了华盛顿的态度后，将由国务卿来宣布美国对接纳大陆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的立场。这些人士说，国务卿一直在指导同其他政府的磋商（尼克松已说这种磋商是上述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他将负责掌管在宣布（美国的立场）以后进行的外交活动。

（美新处华盛顿七月十九日电，《参资》七月二十日（下）第十页）

七月二十一日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决议，取消一九五五年以来给予总统的使用军队来保护福摩萨（指我国领土台湾）和佩斯卡多尔群岛（指我国领土澎湖列岛）的权力。

外委会主席富布赖特对记者说，“从技术上说，委员会的表决并不受总统的宣布的影响，但是委员们的确认为，这一步骤是同政

府谋求恢复同中国的正常关系的立场是一致的。”

他说，“对这个废除权力的提案没有进行唱名表决，但是在口头表决时无人提出反对意见。表决时全体委员都出席了。”

国务院对废除这种权力的决议采取中立立场，它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这个不给总统实际权力但支持他应付危机的决议。

按，提出废除权力提案的是民主党参议员丘奇和共和党参议员马赛厄斯。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七月二十一日电，《参资》七月二十二日（下）第一页）

国务院发言人布雷七月二十一日宣布，美当局已禁止官员就对华问题发表任何意见。担心因发表不成熟的或者不明智的讲话而使总统的北京之行受到危害，

（法新社华盛顿七月二十一日电，《参资》七月二十二日（下）第二页）

国务院发言人布雷七月二十一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答记者问的记录摘要：

问：查尔斯，佐藤首相今天说，他认为美国就总统的访问进行的磋商，就日本来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不能看作是磋商，你对此愿意作出回答吗？

答：我不想直接发表意见来对此作出回答。

可是，我要指出，我们已把总统准备在上星期四晚发表声明的内容通知了日本政府，就象我们已把这个声明的内容通知了许多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我们一直在就共同关心的各种问题与日本政府进行最密切的磋商，并且将继续这样做。

问：有人猜测总统访问中国可能对越南战争有某些影响，或者会使战争加速结束，国务院对这种猜测是否感到关切？是不是这就是国务院对中国对越南问题的立场一般拒绝发表任何意见的原因呢？

答：我想我们希望在总统上星期四晚发表了声明后不要有任何猜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你们也许看到国务院特别闭口不谈这个问题和有关问题，一部分原因是在外交事务中不可能总是清清楚楚地划出分界线。

问：我就是不清楚总统是否不希望白宫或国务院说任何有可能损害他到中国的旅行的话；也不清楚是不是白宫也许也已经向国务院建议对于中国就越南或印度支那问题说的话目前都不表示意见。

答：国务卿无疑已经讲清楚，他希望不要就这个问题正式或非正式地发表意见或进行猜测。

问：查利，你能否帮助我们一下，向我们说明政府和国务卿过去的讲话是否仍反映政府的看法或者国务卿的看法——

我指的是国务卿去年七月对日本电视台记者发表的讲话，在这次谈话里，记者向他问到中国在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方面所起的作用——我引他的话：

“我们认为，中国当然是关键。共产党中国是印度支那前途的关键。如果他们通情达理地谈解决办法，我们想我们可以很快拟就一种和平的解决办法。”

这是不是仍然是国务卿的想法？

答：你——说得缓和点——你给我出了一个有趣味的难题。

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来对此发表意见。这样的问题你可以在国务卿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向他提出。

问：记者招待会什么时候举行呢，查尔斯？

答：本周不举行，但是我认为这次记者招待会有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举行。

问：我们能否得到一份关于自从取消禁运以来对大陆中国的贸易和旅行的情况的报告。

答：要给你一份象个样子的报告，实际上是困难的。我可以说，直到昨天，就我们所知，没有一个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给的护照的人申请签证。关于有多少人和哪些人在申请访问大陆的签证，我们只能掌握一个很不完整的概况，原因是明显的……即：他们不经过我们的手，我们同这个过程毫无牵连。斯潘塞，我想，根据报纸的记述来计算一下去到大陆的人数，将是我们手头掌握的最精确的数字了。我们的印象是，自从六月初放松贸易控制以来，所进行的贸易来往很少，如果有的话。由于同样的实际原因，要令人

满意地掌握关于间接贸易的情况，那就甚至更加困难了。

问：查利，我可否就此只向你再提出一个问题，不是关于禁运，而是关于这点的另一部分。你能否一般地说一说，总统之行怎样影响华沙会谈——华沙大使级会谈——的前景。我们是否仍然希望在华沙举行某种会晤，我们是否仍然希望在华沙同中国人会晤，还是这现在已经变成非实际的了。

答：让我把你的问题记下来。

（美新处华盛顿七月二十一日电，《参资》七月二十二日（下）第三页）

美两名前驻华外交官员约翰·斯图尔特·塞维斯和约翰·佩赖·戴维斯七月二十一日在外委会秘密作证。外委会主席富布赖特认为，美对外政策的错误是未理睬这些人的意见。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二十一日电，《参资》七月二十三日（下）第二十五页）

参议院外委会成员弗兰克·丘奇参议员七月二十一日说，提出废除一九五五年关于台澎的决议是“国会要同中国言归于好的第一个姿态”。

他说：“这也是走向撤销国会在冷战高潮中授给总统的广泛权力的第二步。”

（美联社华盛顿七月二十一日电，《参资》七月二十三日（下）第二十七页）

七月二十五日

《华盛顿邮报》记者斯坦利·卡诺以《中国问题专家们研究有素，但是缺乏第一手的了解；中国问题专家们：观察，等待》为题，报道美国现有的中国问题专家的情况。

全文如下：

当尼克松总统为他在今后若干月中的北京之行进行准备时，他能够依靠一批美国高级专家来取得有关中国的情报和对它的分析。

在过去若干年，尽管中美关系冻结，然而有为数相当多的一批

专家在政府机构、大学和研究中心不倦地工作着，以及时了解在那个国家所发生的情况。那个国家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好象是一个巨大的、遥远的和不能理解的疑团。

但是，美国专家们缺乏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格——亲自在中国获得的经验。因此，一些专家承认，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质量多少有些欠缺。一位在四十年代末期在北京工作过的比较年老的外事人员说："如果你不了解中国的风俗和传统，那你就无法和中国人打交道，你只有呆在那个国家才能得到那种了解"。

而且，由于在五十年代初期已故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和其它一些人对中国问题专家进行了清洗，所以美国积累有关中国问题的专门知识和经验的工作遭到了破坏。

尽管这样，仍然有为数相当多的一批年老的和年轻的中国问题专家，由他们保存着美国对这个亚洲国家所了解的情况。

在这些专家中，有熟悉上海劳工问题的经济学家，也有能够估计广东省大半产量的农学家。

还有一些美国专家，他们能够列举出中国铁路线的时刻表，或者介绍在北京的一些中学所教的课程，或者根据他们的记录进行判断，能够相当准确地预测中国的核试验。

美国的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军事情况的专家了解中国每一个高级军官的情况，几乎能够追溯到这些军官参加共产党队伍的时期。另一个监听中国电台广播的美国专家根据他的记忆，几乎能列举过去十年中北京在对外政策方面发表的每一个重要的声明。

政府内外的中国问题专家们都在设法猜测，如果中美建立外交关系，谁可能是美国的第一任驻北京大使。

一些专家们认为，担任这一职务的合理的候选人是五十四岁的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

格林以前担任过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和驻香港总领事，他长期以来就主张同北京和解——虽然据一些可靠人士说，他没有参与安排总统的中国之行的秘密活动。

据中国问题专家们说，另一个可能派驻北京的使节是五十岁的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戴维·奥斯本（DAVID OSBORN）。奥斯本同格林一样，最初是作为一位日本问题专家开始他的外交生涯的，但是他

已经把他的研究范围扩大而包括中国在内。

大约有九十名中国问题专家在华盛顿的国务院中工作或被派往美国在国外的外交使团。负责管理在华盛顿和台湾的中文训练班的外交学院每年向这个系统输送三个或四个年青的官员。

就象供考古用的遗址一样，国务院中的中国问题专家们也是显得按时间分层的。在许多方面，一个专家的看法会受他在美国对华政策的不同阶段的经历的影响。

因此，一些分析家说，那些从美国对北京采取僵硬态度的时期走过来的专家们倾向于采取较为保守的态度，而许多年青的官员则采取较为开明的态度。

在老一辈的人中包括一些五十多岁的人，例如国务院亚洲共产党事务司司长艾尔弗雷德·詹金斯（ALFRED JENKINS）和前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埃德温·马丁（EDWINMARTIN）。他们两人在共产党人于一九四九年接管以前曾在北京学过中文。

在北京的亲身经历使得这一代人同一批年轻的官员——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在中国生活过——分离开来。在这些人当中被人们认为最有能力的是美国驻坦桑尼亚使团副团长保罗·克赖斯伯格（PAUL KREISBERG）和美国驻香港总领馆的第二号人物戴维·迪安（DAVID DEAN）.

另一个这一类的被认为是出色的高级官员是威廉·格莱斯廷（WILLIAM GLEYSTEEN），他最近被任命为驻台湾代表团的副团长。格莱斯廷生于中国，是最后一个美国驻北京总领事埃德蒙·克拉布（EDMUND CLUBB）的女婿。

同华盛顿掌权的人非常接近的观察中国局势的人有约翰·霍尔德里奇（JOHN HOLDRIDGE），他自一九六九年夏季以来一直在基辛格领导的白宫班子里工作。霍尔德里奇和越南问题专家理查德·斯米泽（RICHARD SMYSER）一起在两周前，曾陪同基辛格去过北京。

国务院的一批更年轻的中国问题专家中有如下的官员：莫顿·阿布拉莫维茨（MORTON ABRAMOWITZ）、威廉·布朗（WILLIAM BROWN）、查尔斯·希尔（CHARLES HILL）、伯顿·莱文（BURTON LEVIN）、尼古拉斯·普拉特（NICHOLAS PLATT）和约翰·泰勒（JOHN TAYLOR）程这些官员担任各种职务，有些与中国问题无关。

例如，普拉特是在国务卿罗杰斯的办公室工作，而希尔是美国驻西贡大使邦克的特别助理。

中央情报局的专家

国务院经常调动它的专家的职务，以防止他们同马歇尔将军通常所说的“地方”结交。中央情报局同国务院的做法不同，它似乎是要它的中国问题分析家长期搞自己的专业。

由于这个原故，再加上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大多数没有受到麦卡锡在五十年代初期的调查活动的影响，因此据说中央情报局拥有一批最有学问的军事问题专家。

除了在一些学术杂志上发表过关于中国的分析性文章的专家，像菲利普·布里奇哈姆（PHILIP BRIDGHAM）和查尔斯·诺伊豪泽（CHARLES NEUHAUSER）等以外，大多数中央情报局的专家是公众所不知道的。

但是，他们的专门知识的精湛程度有时是显而易见的，中央情报局在两年前为国会撰写的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报告。这份报告被认为是在这个问题上的一项重要作品。

据某些人士说，自从中央情报局的前副局长雷·克莱因（RAYCLINE）调任其它职务以来，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已大大缓和了。克莱因在六十年代初曾在台湾任职，他是接近蒋经国的。

现在他是国务院情报研究司的司长。据说，他已内定将担任负责情报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这是国防部新设置的职务。

五角大楼专家

国防部中国科的高级人员被认为是政府中最保守的一派。五角大楼中负责中国问题的重要人物是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防部长帮办丹尼斯·杜林（DENNIS DOOLIN），他以前是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曾在斯坦福大学任教。

据说，杜林和他的上司助理国防部长沃伦·纳特（G.WARREN NUTTER）一样，持有保守的观点。纳特在一九六四年总统竞选运动时，曾担任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的顾问。

由于急于要加强美国在台湾（蒋介石的岛屿堡垒）的军事基地，

五角大楼最近建议总统把在冲绳的某些美国核武器迁移到那里去，冲绳预定将在明年归还给日本。据说，尼克松已拒绝这项建议，认为这同他谋求同北京缓和关系的努力相抵触。

从技术人员方面来说，据说五角大楼有一些博学多识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之中有国防情报局的埃里克·奥姆(ERIC ORME)和小保罗·默里(PAUL MURRAY JR.)。默里是在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司政策计划科中负责中国问题的人。

思想库

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各种各样的“思想库”对政府关于中国问题的情况了解和分析作出重大贡献。这些研究中心不是由政府津贴的，就是根据合同进行工作的。

兰德公司在华盛顿和加利福尼亚洲圣莫尼卡设有办事处。兰德公司雇用了美国第一流的中国军事事务专家威廉·惠特森(WILLIAM W. WHITSON)博士。惠特森是一位退役的陆军上校，曾得到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很快就要出版《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指挥部》一书，此书可能成为一部说明中国的军方在政治上的作用的很有份量的著作。

兰德公司里还有美国的两位著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理查德·穆斯廷(RICHARD MOORSTEEN)和叶(K. C.YEH)。穆斯廷和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莫顿·阿布拉莫维茨(MORTON ABRAMOWITZ)在新出版的《重新制定对华政策》一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美国与北京之间的关系的建议。

兰德公司的另一位权威托马斯·鲁宾逊(THOMAS W. ROBI NSON)完成了一项有关中国总理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文化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的重大研究工作。他现在正在写作毛泽东的指定的继承人林彪的两卷传记。

大学里的专家

在设在华盛顿郊外的另一个“思想库”国际分析研究所的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中有艾丽斯·兰利·谢(ALICEAN LGLEY HSIEH)，她是专门研究中国的发展核武器和先进武器的工作的。

美国的五六个设有专门的亚洲问题研究中心的大学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一个重要来源。约翰·林德贝克(JOHN LINDBECK)在使学术界和政府里的中国问题专家汇合起来方面起了枢纽的作用。他已于去年秋天逝世。

美国学术界最著名的中国问题权威是哈佛大学亚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约翰·费正清教授。费正清是一位历史学家，最初研究清朝的历史，他在训练学者和在大学里使人们对中国问题产生兴趣方面可能比任何人做的事情都要多。

他自己写的象《美国同中国的关系》之类的书以及他与美国前驻日本大使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教授合写的两卷的远东史是美国研究亚洲问题的人必读的书籍。

费正清的哈佛大学研究中心还出版了一百多种论述远东问题的书籍和专题论文。除此之外，费正清还对在学术界和政府中几十个中国问题专家进行精神上的指导工作。其中有些人开玩笑地把他称为费正清“主席”，意思是说他的地位与毛相当。

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包括这样一批重要的人物：他们是曾经写过关于毛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划时代的研究报告的本杰明·施瓦茨(BENJAMIN SCHWARTZ)，研究中国问题的不多几个社会学家之一的埃兹拉·沃格尔(EZRA VOGEL)，著名的经济学家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GS)研究中美关系问题的专家小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 JR.)和美国研究中国法律问题的老资格的专家杰罗姆·科恩(JEROME COHEN)。

费正清在使美国注意中国方面起的作用最大，仅次于他的是多克·巴尼特(DOAK BARNETT)，他以前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现在在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工作。他出生在中国，他作为一个记者、学者和政策顾问，工作干得很出色。

密执安大学有另外一大批中国问题专家。他们之中包括经济学家亚历山大·埃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以及政治学家艾伦·惠廷(ALLEN WHITING)和理查德·索洛蒙(RICHARD SOLOMON)。

惠廷以前曾在国务院工作，索洛蒙预定于今年秋天参加基辛格领导下的白宫班子，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界之间的密切关系。

国内其它地方的一些大学中的名流包括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家威廉·斯金纳(WILLIAM SKINNEK)，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家迈克尔·奥格森伯格(MICHAEL OKSENBERG)和在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负责人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

美国的引起最大争论然而也受人尊敬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是同伯克利的社会学家弗朗兹·舒尔曼(FRANZ SCHURMANN)。他同时领导旧金山的海湾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培养了一批年轻的观点很左的专家。

这些激进分子曾组织了一个名叫“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的组织，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采取左倾的立场，抗议美国卷入印度支那的做法。有几个人宣布他们自己是毛泽东主义者。其中有一个名叫理查德·佩弗(RICHARD PFEFFER)的激进分子（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在不久以前于华盛顿举行的一次有著名人士参加的会议上用一句粗鲁的骂人的话回答了一个发言者。

北京上个月由中国政府出钱邀请这些学者中的一些人到中国去，这样就是对这些学者的“承认”。让这批人进行了一次堂皇的旅行，他们参观了南京附近的导弹追踪站，并且会见了周恩来。周恩来是世界上最有才干的外交家之一，刚刚在会见他们的前几天同基辛格进行了会晤。

但是，尽管在政府或各个大学中的中国问题专家有各种专长，但是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都缺乏一个重要的资格——即在中国的直接经验。正如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所说的：“我们从来没有站在中国土地上的感觉”。

麦卡锡的清洗

中国和美国彼此完全断绝关系已经有二十多年，这批对中国有第一手知识的熟悉情况的专家大多数在五十年代初期被清洗了，当时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帕特里克·麦卡伦和另外一些人由于调查所谓的共产党人而把国务院的大多数人员搞掉了。

在麦卡锡时代的两名著名的受害者——前国务院专家约翰·斯图尔特·塞维斯(JOHN STEWART SERVICE)和约翰·佩顿·戴维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